

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 一个文献综述

魏福成*

摘要: 本文对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基本因素的四种看法或假说进行了回顾与梳理,包括运气(多重均衡)假说、文化与宗教信仰假说、地理与疾病假说以及制度和政策假说。这四种因素都会通过影响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直接因素,从而影响经济发展与增长。然而,运气、文化和地理都不足以产生持续和巨大的人均收入的跨国差异,无法解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相反,制度和政策假说能很好地解释各国人均收入差异以及1500年以来世界财富的逆转。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相信,制度和政策是经济发展与增长的主要的基本因素。本文把重点放在有关“制度和政策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的文献上,总结了有关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内生的文献,并进行了结论性述评。

关键词: 经济发展 运气 文化 地理 制度与政策

一、引言

1800年以前,“马尔萨斯陷阱”是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各国人均收入几乎没有增长,人均收入的跨国差异也很小(Maddison, 2003)。然而,自工业革命以来,一些西欧国家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实现了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型,逐步从贫穷走向了富裕。但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仍然生产率低下,物质资本及人力资本积累缓慢,新技术未被大范围采用,经济增长难以为继,导致人均收入低下。在探寻经济增长的原因时,我们需要区分直接原因(proximate causes)和更深层的或基本的原因(fundamental causes)^①。有关经济发展与增长的研究表明,物资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本的差异,是导致一国经济随时间增长和巨大的跨国人均收入差异的直接原因(Mankiw, et al, 1992 Hall and Jones, 1999)。

然而,为什么有的国家能积累充足的(物质和人力)资本和采用先进的技术,从而实现了持续增长,而有的国家则发展缓慢甚至停滞衰退?阻碍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因是什么?如何解释巨大的跨国人均收入差异?经济学家们分别从运气(多重均衡)、文化、地理以及制度和政策四个方面进行了考察。这四种因素都能对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影响经济发展(Acemoglu, 2009)。然而,在对许多经验特征事实进行考察,或者同时将制度和政策考虑到计量检验模型中时,就能发现,运气、文化和地理都无法解释人均收入的跨国差异。相反,尽管不存在完全一致的看法,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相信,制度和政策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为根本的因素,因而也是导致巨大的跨国人均收入差异的基本原因。本文将对这四种有关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的看法进行回顾,并把重点放在有关“制度和政策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的文献上,对近年来的有关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内生的文献进行总结,最后是结论性述评。

二、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 运气与多重均衡假说

第一种有关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基本原因的假说认为,人均收入的跨国差异,源于在多重均衡中的不同选择。许多文献强调,现代经济在生产 and 投资方面都存在外部性和互补性,由于预期或信贷市场不完全的程度不同,可能导致经济行为人之间的协同成功或失败,则多重均衡或多重稳态将会出现。因而,给定各种相同的参数,两个经济体能够展现出完全不同的行为:一个是高的人均产出和持续的增长,另一个是贫穷和停滞。

* 魏福成,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系、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IAS), 邮政编码: 430072, 电子信箱: weif@163.com。作者非常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且细致的建议,这使得本文的质量得到极大的改进。

^①North和Thomas(1973)最早批评了增长理论只强调直接原因而忽视了经济增长的基本原因,“我们已经探讨的因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不是增长的原因,而是增长本身”。

该假说的重要文献包括 Murphy等 (1989)、A zariadis和 Drazen (1990)、Matsuyama(1991)等。Murphy等 (1989)将早期的“大推进”思想模型化,假定现代产业(或现代技术)存在规模经济,因而要使得现代产业有利可图,则必须有足够的需求。如果经济中没有足够多的产业采用现代技术进行生产,那么整个经济对那些已经采用现代技术的产业的产品需求将非常有限,从而使得这些现代产业将会发生亏损或无利可图。预期到这一点,所有这些现代产业也将不会出现。因而,由于协同投资于现代产业的失败,经济将长期处在传统的产业中无法自拔,低收入和停滞的陷阱将长期存在。相反,如果经济中有足够多的现代产业出现,由于需求的互补性,那么这些现代产业生产的产品将面临足够多的需求,从而使得运行现代产业的厂商将有利可图。进一步地,一旦有足够多的现代产业出现,那些还未进行产业升级或转型的产业,其产品的需求会下降,从而继续运行传统技术进行生产将无利可图,而进行产业升级或投资于现代生产技术将能获利。因此,一旦有足够多的产业进行协同投资,经济将逐渐地收敛于现代产业的均衡中。

类似地,A zariadis和 Drazen(1990)在人力资本积累存在外部性,Matsuyama(1991)在现代产业中劳动的边际产品存在规模经济,以及 Redding(1996)在工人的人力资本与企业的生产技术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存在互补性等假定下,同样得出了“预期和信贷市场不完全会导致多重均衡的出现”的结论和含义。其他文献还包括 Ghiglino和 Sogger(2002)等。Ciccone和 Matsuyama(1996)对这些文献进行了很好的回顾,并提出了其他可能会导致协同问题出现从而多重均衡的原因。

综上,运气和多重均衡假说认为,当存在由于预期、信贷市场不完全或初始条件所导致的协同失败时,经济将收敛于低水平均衡陷阱,反之,经济将能实现“起飞”和转型,高水平 and 持续增长的均衡将会出现。所以,预期、信贷市场不完全程度或者其他初始条件(即运气和多重均衡),将决定(人力和物质)资本的积累和技术进步与采用,从而决定经济发展与增长。

运气和多重均衡假说为我们理解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它强调了运气和历史的作用。然而,该假说并不能为巨大的人均收入的跨国差异提供合理的解释。我们应该认为美国和尼日利亚的巨大的人均收入差异,是因为美国非常幸运而尼日利亚则非常不幸吗?或者说,当今的富国之所以富有是因为它们在几十年前或两百年前由于运气实现了协同,从而摆脱了低水平均衡,而当今的穷国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它们自有历史以来从来都处于坏的运气中,从而从没有摆脱低水平均衡?我们很难相信这种解释。更重要的是,在许多多重均衡模型中,都存在帕累托排序的多重均衡(Pareto-ranked equilibria),那么,为什么对于所有人更好的均衡在长期中都无法实现?这些都是运气和多重均衡假说所无法解释的。因而,无需用其他的假说(即后文将论述的文化、地理以及制度和政策假说)来反驳和对比,仅仅以简单的经验事实为依据,运气和多重均衡假说便不能作为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基本原因,也不能解释巨大的跨国人均收入差异(Easterly and Levine 2002, 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5a)。

三、经济增长的基本原因:文化与社会资本假说

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基本原因的第三种假说强调的是,不同社会(民族)具有不同的历史经历或宗教信仰,从而具有不同的文化。许多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文化是价值观、偏好以及信念的一个关键的决定因素,而后者对经济绩效具有重要作用,所以,文化差异可能会导致经济绩效的差异。

将文化与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思想,最著名的是 Weber(1930)。Weber认为,工业化起源于西欧,可归因于文化因素,即新教改革和加尔文主义(Calvinism)的兴起,英国人的虔诚和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新教伦理产生了一组信念和价值观,强调努力工作、节俭和储蓄,并且将经济成功理解为与上帝的意愿和选择是一致的。而且,许多历史学家和学者都认为,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兴起,而且包括经济增长过程和工业化在内,都与文化和宗教信仰密切相关。Weber(1930, 1958)对宗教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进行了精彩论述,此后的许多其他学者发展了这个思想,比如, Landes(1998)试图以文化和宗教变量来解释西方的兴起,但这个证据受到 Acemoglu等(2005b)的批评。

进一步地,文化假说意味着,有些社会也许会变得“运转不良”从而导致差的经济绩效,因为它们的文化价值观和信念体系不鼓励合作和协调。这种观点最早是由 Banfield(1958)对意大利南部的贫穷的考察中发展起来的,他认为意大利南部的贫穷主要是因为那里的人们接受了一种家庭主义(amoral familism)文化:人们仅信任自己家庭中的成员,拒绝与家庭外的人合作。这个思想后来由 Putnam(1993)和 Grief(2006)等进行了发展,并将能导致合作和其他“好的结果”的文化态度和价值观定义为“社会资本”。这些思想的许多版本出现在经济学文献中,包括 North等(2000)以及 Wiarda(2001)等在内,都强调文化因素在解释拉丁美洲国家经济落后方面的重要性。Knack和 Keefer(1995)、Durlauf和 Fafchamps(2005)得出了社会资本与经济绩效具有正相关的结论,Barro和 McLeary(2006)提供了宗教信仰与经济发展之间正相关的证据,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它们具有因果关系,因为社会资本、文化和宗教信仰存在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它们可能内生于其他决

定经济结果和收入差异的基本原因之中。最近许多文献试图去克服这些困难,但都没有取得满意的结果。

在比较殖民地各国的发展的时候,一方面,有些人会认为文化也许在殖民地的经济经历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因为欧洲人不仅带来了新的制度,也带来了他们自己的“文化”,这种观点解释了为什么信仰天主教和伊比利亚(Iberian)文化的拉丁美洲要比信仰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新教的北美(美国、加拿大)穷。然而,Açemoglu等(2002)表明,一旦将经济制度考虑进来,文化并不能对经济发展的跨国差异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尽管新加坡和香港地区只有很少的欧洲人,但现在却是处于最富有的国家和地区之列,而具有很多欧洲后代的阿根廷和乌拉圭,却要穷得多。这进一步说明,殖民者的文化和宗教信仰并不是殖民地如今的跨国收入差异的根源。

进一步地,以文化来解释经济增长的理论还面临两个主要挑战。首先是对文化测度的困难。尽管Putnam以及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在测度某些文化特征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存在同义反复的问题和危险。第二个困难和挑战在于如何有效解释增长奇迹,比如中国、韩国、新加坡和香港地区。如果亚洲文化价值观是这些国家(地区)成功的增长经历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很难解释为什么亚洲文化没有导致这些国家更早的时候开始持续的经济增长?(Açemoglu, 2009)这些困难和挑战或许是可以克服的,然而相关模型至今仍然没有发展出来。

综上,文化和宗教信仰虽然能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但该假说一方面还缺乏正式的模型,另一方面无法对许多经验事实作出合理解释,无论是在简单的国别比较方面,还是在考虑到制度和政策差异的计量检验方面。因而,文化和宗教信仰并不是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基本因素。

四、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地理因素假说

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基本原因的第三种假说强调地理因素。地理因素假说宣称,经济成就的差别反映了各国之间地理、气候和生态等因素的差异。这样的假设有许多不同版本,最普遍的一种观点是,气候和地理对于人们的工作努力、激励和生产率等有重要影响,因此对收入水平产生了直接影响。相对于前两种假说(运气假说和文化假说),地理因素假说是较为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简单地理因素假说:不随时间变化的地理因素

Diamond(1997)认为,地理因素决定了定居农业的时机和性质,进而决定了一个社会是否能够发展出复杂的组织、先进的文明和技术,从而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持续的影响。而Sachs(2000, 2001)强调地理因素对流行病、交通成本和技术的影响,“这世界的某些地方具有地理优势,包括靠近重要的资源、靠近海岸线、拥有适合航行的河流、紧邻其他成功的经济体、有利于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以及对人类健康有利的因素等。”^①特别地,Gallup和Sachs(2000)等也认为流行疾病(如疟疾)和低寿命预期会导致热带的非洲国家无法积累充足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从而导致了低的人均收入。这类简化的地理因素假说意味着,某个地区的经济表现(相对贫富)将保持稳定,因为最重要的许多地理因素本身是非常恒定的。然而,世界各殖民地相对贫富水平的逆转这一经验事实并不支持这种假设(Açemoglu et al, 2002)。而且,这些文献都强调的是地理因素对农业生产力的影响,然而,研究表明那些今天是穷的国家是因为它们未能实现工业化。那么,由于不利的地理因素导致的低的农业生产率应该意味着鼓励那些缺乏地理优势的国家发展工业,从而实现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而不是相反。所以,简单地理因素假说不符合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特征事实。

(二)复杂地理因素假说:地理条件随时间变化

然而,国家之间(比如前殖民地国家)财富逆转现象未必能推翻更复杂的地理因素假说:在过去(比如1500年时)对经济发展无用甚至有害的某些地理因素到后来可能变成有利条件。第一种复杂的地理因素假说是“温带转移假说”:与热带地区相反,温带地区将在后来逐渐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随着一些技术的出现,地理位置的作用会更加明显。Sachs(2001)借鉴了Diamond(1997)关于技术在不同生态环境里进行推广的论点,认为“农业、医疗以及相关领域的某些技术可能适合在同一个生态环境里进行推广,而不适合在其他的生态环境里进行推广,因此,经济发展的成果扩散到了广大温带地区,而对热带地区却没有效果。”然而,Açemoglu等(2002)提供的证据表明,贫富的逆转并不是适合温带地区的农业技术的出现所导致的结果。首先,实证结果表明,逆转与地理因素没有什么联系。其次,温带转移假说预示,逆转应该与欧洲农业技术的扩散有关,但实际上,欧洲的农业技术在16-18世纪期间推广到各殖民地,而贫富的逆转主要是发生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早期,是与工业化有关的现象。因而,“温带转移假说”也与经验事实不符。

考虑到逆转现象与工业化有关,第二种复杂的地理因素假说版本是,存在某些地理因素,它们对工业化

^①Sachs J. D. 2000. “Notes on a New Sociolo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 ed. Lawrence E. Harrison and Samuel P. Huntington, 30. New York, Basic Books

比较有利。首先,工业的发展需要贸易的支持,如果各国的交通便利程度不同,那么交通成本比较低的国家就可以在工业化时代率先起飞。但这种论点并不完全具有说服力,因为实际的逆转与这些地理因素并没有什么联系。而且,那些之前比较繁荣却没有成功走向工业化的殖民地中包括许多岛国,如加勒比群岛等,以及中美洲各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具有天然港口的国家。此外,许多没有走向工业化的国家的交通运输成本其实并不高。其次,我们还可以假定,有的国家可能缺乏工业化所必需的某些资源,特别是煤炭、铁矿石等,因此耽误了工业化进程。然而,煤炭是世界上最常见的一种资源,在世界 100 多个国家都有储量 (World Coal Institute 2000)。Acemoglu 等 (2002) 表明,缺乏煤炭或者其他 (对工业化而言) 重要的资源并不能解释财富分配的逆转或人均收入的跨国差异。因此,这些复杂的地理因素假说都缺乏数据及经验支持。

类似地,不支持地理因素假说的文献还包括 Rodrik 等 (2004) 以及 Easterly 和 Levine (2002) 等,他们通过计量模型对前殖民地国家进行比较发现,一旦考虑制度的影响,地理因素对收入水平的直接效应很弱,制度质量尤其是产权和法律规则与收入水平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性。

总之,地理因素 (气候、疾病、资源和地形等) 虽然会对人们的经济活动产生重要影响,但与文化和宗教信仰假说类似,一方面地理因素无法与一些重要的特征事实相符,另一方面如果把制度因素考虑进去,地理因素对跨国人均收入差异的直接效应很小。所以,地理因素无法成为人均收入跨国差异的基本决定因素。

五、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 制度与政策假说

最后,也是得到广泛认同的一种看法是,制度和政策是造成人均收入的跨国差异的根本原因。制度和政策决定了经济活动的成本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决定了经济行为人在劳动供给、资本积累、对技术的采用和创新、对风险的承担,以及提供公共品等方面的行为。持续的经济增长离不开“好的”制度,比如,私有产权保护能够激励各种投资和增加产出的活动,相反,掠夺性制度导致投资不足和低的生产率,从而阻碍经济发展。尽管不存在完全一致的看法,但是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制度和政策是造成不同经济绩效的基本原因。一些经济制度和政策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壁垒,使得资源和租金从非精英转移到精英手中。这些制度和政策扭曲了经济激励,阻碍了技术引进和创新,也阻碍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并使市场组织方式处于无效率状态。

(一) 制度和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自从亚当·斯密以来,许多经济学家都强调过制度和政策对经济的重要影响。North 和 Thomas (1973) 认为制度 (特别是产权制度) 决定了经济绩效。Olson (1982, 2000) 认为利益集团会通过游说或直接制定政策等方式,设置各种进入壁垒和管制,从而造成一国经济的停滞和衰退。

沿着这些思路,其他经济学家对制度和政策进行了更为规范和细致的分析。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 Parente 和 Prescott (1999)。他们考察了 (劳动) 要素供给的垄断对新技术和生产率的提高的阻碍,穷国穷是因为在许多行业存在要素供给的垄断,从而导致有效的技术未能采用。通过校准发现,如果排除这些垄断,穷国的产出能增加三倍。这说明制度和政策的差异会导致各国经济发展的差异。

Ngai (2004) 认为各国物质资本积累的壁垒的差异,可以足够解释跨国收入差异。在她的模型中,假定生产既可以使用 Malthus 技术 (传统技术), 也可以使用 Solow 技术 (现代技术), 两种技术使用不同类型的资本。通过模型及计量检验发现,对不同类型的资本积累设置不同的壁垒和障碍,会导致不同的经济转型启动时间和经济转型速度,从而解释了巨大的人均收入差异。

有关制度和政策是决定经济绩效的基本原因的研究,最为重要的无疑是 Acemoglu 等 (2001, 2002, 2005) 的研究工作,他们在一系列的文章中探讨了产权制度、民主政治以及宪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 Acemoglu 等 (2001) 中,他们考察了 64 个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差异,认为欧洲殖民者在殖民地建立的制度决定了殖民地后来的经济绩效。他们以欧洲殖民者在殖民地的死亡率作为工具变量,发现当死亡率越高时,欧洲殖民者越倾向于在殖民地建立掠夺性制度,反之,死亡率越低,则越倾向于建立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这些制度一旦建立,它们在殖民地独立后仍然存在或发挥重要影响。通过实证发现,当时的死亡率与殖民地国家在 1995 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负相关,并且结果是稳健的 (robust)。这表明制度和政策的差异,是导致前殖民地国家经济差异的主要因素。

随后 Acemoglu 等 (2002) 考察了 1500 年以来前欧洲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财富逆转现象: 在公元 1500 年左右许多相对富裕的国家现在变得相对贫困起来,而那些相对贫穷的地区则变得相对富裕。Acemoglu 等 (2002) 强调,当地的人口密度和经济繁荣程度对欧洲人后来采纳的政策具有重要影响。在那些原先比较贫穷的地区,人口十分稀少,让欧洲人可以大量移民过来,殖民者因而引进了私有产权制度;而那些原先人口稠密、比较富裕的地区,建立掠夺性制度对于殖民者而言则更加有利可图。因而,欧洲殖民者的到来,带来了一种“制度安排的颠倒”,使得原本富裕的地区因殖民者建立的掠夺性制度而在随后变得相对贫穷,而那些原

本贫穷的地区则因殖民者建立的私有产权制度而变得相对富裕。这再次说明,制度和政策是导致前殖民地国家经济绩效差异的根本原因。

与 Acemoglu 等持类似看法的文献还包括前文提到的 Rodrik 等 (2004)、Easterly 和 Levine (2002) 等。综合,经济学家们分别从理论和实证方面表明,制度和政策对经济发展有着根本的影响。相对于前三种假说,制度和政策假说能够解释国别之间的许多特征事实,也能解释巨大的跨国收入差异。因而,制度和政策是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基本原因。

(二) 无效率经济制度与政策的来源

然而,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利益集团和政策制定者(政府),为什么不取消无效率的制度和政策,以促进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然后通过税收和再分配手段获得更大的租金?

第一种可能的原因是政府缺乏直接和有效的财政工具,以致“政府能力”(state capacity)不足以收取足够的租金和税收(Olson, 1982; Acemoglu, 2005, 2007; Besley and Persson, 2010),从而导致各种有害的间接分配工具(如进入壁垒等)的使用,以维护精英(具有政治影响力优势的集团)的市场垄断地位以及降低生产要素的价格,提高他们的利润。

第二种解释是,尽管取消有害的壁垒和障碍能促进新技术的引入和资本积累,从而提高精英掌握政治权力时的租金,但是这些经济变化可能会对他们未来掌权产生不利影响。一旦精英失去政治权力,便不能获得租金。如果后者的效应足够大,那么精英就会阻碍生产率的提高。大量事实说明,在许多国家,精英集团出于对掌权的考量,设置了许多壁垒和障碍阻止技术进步或人力资本积累(Gerschenkron, 1970; Husain, 1999; Robinson, 2001)。这方面的文献包括 Acemoglu 和 Robinson (2000b)、Bourignon 和 Verdier (2000)、Robinson (2001)、Eicher 和 Ypersele (2009)、邹薇和魏福成 (2010a) 等,他们或者是在两期及外生掌权概率下进行的考察,或者在无限期及内生掌权概率下进行了分析。因而,这些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的分析表明,有害的制度和政策的长期存在并不能通过提高“政府能力”解决,即使掌权精英具有有效的财政工具,出于对其未来掌权概率的考虑,也可能不会取消有害的制度和政策。

第三种可能的原因是,即使政府具有足够的能力进行征税,并且不存在政权冲击,经济发展条件的改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或产业升级等)并不一定能给权贵阶层带来更大的预期收益,因而权贵或强势利益集团仍然会设置有害的制度和政策。Acemoglu (2007) 认为当存在套牢(holdup)时,会导致非精英阶层在事前(即税率设定之前)的投资和生产率的改进方面不足,阻碍了经济发展。邹薇和魏福成 (2010b) 考察了权贵和强势利益集团阻碍产业升级的两种因素: 税收掠夺和中间品价格的操控(manipulation)。一方面,产业升级会降低均衡税率,这有可能降低权贵通过税收获得的收益; 另一方面,欠发达国家许多重要的中间品的生产和自然资源都掌握在权贵和强势利益集团手中,而产业升级有可能降低对这些中间品的需求和价格,导致权贵的利润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权贵阶层就会使用政治权力阻止产业升级。

(三) 内生的政治制度

更进一步地,既然经济制度和政策是经济发展与否的根源,那么,为什么不同的社会会选择不同的经济制度和政策? 这就要求考察政治制度的差异,因为政治制度决定了精英阶层和非精英阶层的政治权力,从而影响着政策决策和经济制度。

政治制度可以分为民主政治和非民主政治(寡头政治或独裁体制)。在非民主政治下,政治权力掌握在少数的精英手中,因而他们具有极大的能力去设置有害的经济制度和政策,而在民主制度下,精英的政治权力受到有效的制衡,因而有害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便不容易出现。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政治制度? 为什么有些国家成功地从非民主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而有些国家则没有? 政治科学家如 Lipset (1959) 和 Moore (1966) 等都研究过民主的起源,但缺乏经济学的视角。Olson (1993) 认为由于偶然因素,几个匪帮之间可能会出现势均力敌的状态,为了避免没有赢家的战争,几个匪帮就会通过某种方法或制度分享权力,这种政治制度即为民主体制。在有关政治制度内生或转型的研究中,最重要的是 Acemoglu 等 (2000a, 2005b, 2006), 他们在一系列文章中考察了一个社会从寡头(非民主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型的可能性,给出了严格的模型、丰富的条件和经验证据。这些文献的一个主要的共同思想是,民主制度的出现,是政治精英和强势利益集团为阻止和避免广泛的社会动荡和革命而采取的策略性决策。由于暂时的财富转移(从精英到非精英)或妥协(如取消进入壁垒)并不能保证未来的财富转移和妥协能够继续,因而,掌权的精英阶层为了避免革命,主动改变政治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型,因为民主政治能够保证或作出承诺,非精英阶层在未来能够获得对他们有利的再分配、产权保护等政策。^① Acemoglu 和 Robinson (2006) 进一步对民主化及民主的巩固给出

^①其他三种民主化的理论包括:精英阶层的价值观的变化、精英阶层的内部政治竞争导致需收买外部的集团进入政治体系以及中产阶层的出现(Moore, 1966)。这些理论都无法很好地解释历史事实,并且同样缺乏严格的模型。

了更细致的考察。他们认为,市民社会越发达、中产阶层的扩大、全球化、精英阶层内部的不平等和冲突、社会冲击与危机、精英阶层的收入与财富更多地来源于资本等,都将使得革命或革命威胁更加有效,而镇压则会面临极大的成本或者失败,从而导致寡头或独裁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变。

A cem og lu 等的研究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视角,使得我们能够更细致地理解政治制度的变迁和巩固。然而,这些文献的一个共同缺陷是,或者认为革命一旦成功,民主便出现(至少暂时性地),或者无法解释在(革命成功后的初期)短暂的民主之后,新的精英为什么会将民主政治转为专制体制^①,即非精英集团内部在革命成功后不存在异质性或冲突。因而,这些研究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历史上许多国家,非精英推翻了原先的专制统治之后,没有实现民主政治,而是由他们的领袖和领导层(即新的精英)建立了另一个专制体制?根据许多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观点,在考察政治制度的变迁时,出发点应是:在给定时期,政治制度由掌权精英^②决定。在这里,掌权精英可以包括革命中取得胜利的领导和领袖(即新的统治阶层),尽管之前他们是非精英。掌权精英可以在平均主义、专制(极端地,奴隶制)、民主政治(即自由劳动制)三大制度中进行选择,这三种基本的政治制度定义了各种可供选择的经济制度和政策的集合。因而,革命成功后,革命领导层和领袖(即新的精英)面临政治制度的选择问题。

专制与奴隶制本质上是相同的,工人(非精英)所获得的工资低于其劳动的边际产品(Rodrik, 1999);而自由劳动制即为民主政治,因为工人(非精英)获得的工资与劳动的边际报酬是一致的。那么,为什么在有些时候(人类早期),精英会选择平均主义制度,既不占有财产,也不奴役非精英,而有些时候则选择奴役和专制制度,以及在近一百多年里有些社会则选择了自由劳动制(民主)呢?即这三种制度为何会发生转型? Lagerbif (2009)以长期视角对三种制度进行了模型化分析,他认为随着人口和(土地)生产率这两个关键因素的上升,精英所选择的制度会从平均主义转向奴隶制(专制),在一定的假设下,最终转向自由劳动制度(民主)。然而,这些理论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实行民主(自由劳动制)的国家,有人口多的大国(如美国),也有人口少的小国(意大利)?专制独裁(奴役)的情形也是如此。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同一个社会(国家)在民主与独裁之间反复交替的经验事实(如拉美等一些国家)。鉴于此,Zou和Wei(2010)以一个长期视角,分析了内生化的劳动生产率、非精英占人口的比例,是怎样影响三大制度带给精英的成本和收益的,从而决定了掌权精英对三大制度的选择。我们的分析表明,当劳动生产率很低时,无论非精英所占人口比例为多少,精英都将选择平均主义制;当劳动生产率处于中等水平时,随着非精英占人口的比例从较小值开始不断上升,精英对制度的选择会从平均主义到奴隶制(专制)最后到自由劳动制(民主);最后,当劳动生产率足够高时,如果精英在奴隶制与自由劳动制下付出的成本之比不断上升,则精英对制度的选择将从奴隶制(专制)转向自由劳动制(民主),否则,自由劳动制不会出现。总之,不同于以往文献,Zou和Wei(2010)强调劳动生产率、非精英人口与精英人口的比例这两个关键因素,通过影响制度成本和总产出,从而决定了专制(奴隶制)与民主(自由劳动制)是否出现。该模型能有效地解释为什么具有相似的人口规模或劳动生产率的不同国家(或一国的不同时期),由于非精英人口与精英人口的比例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政治制度。但是,该文没有进行计量检验,其中的一个难点是精英(或非精英)的测度存在很大困难,这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研究计划。

六、结论性述评

运气(多重均衡)、文化(宗教信仰)、地理以及制度和政策都会对人力资本积累、物质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经济活动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影响经济发展与增长。然而,运气、文化、地理都不足以产生持续和巨大的人均收入的跨国差异,也无法解释许多经验特征事实,因而不能成为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基本因素。相反,制度和政策假说能很好地解释人均收入的差异、殖民地的经济发展的差异以及1500年以来世界财富的逆转。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都相信,制度和政策是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基本因素。

然而,强调制度和政策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基本因素,并不意味着运气、文化和地理不重要。事实上,这四个基本因素是潜在互补的,它们对经济发展都有潜在影响。更进一步地,制度和政策本身可能会受到运气、文化和地理的影响。首先,不同的运气产生不同的均衡,而不同的均衡可能会进一步产生不同的制度和政策,比如低水平均衡可能产生掠夺性制度,而高水平均衡产生促进生产的私有产权制度。其次,文化和宗教信仰会影响人们的偏好、价值观、道德和人们交往合作的方式,从而影响制度和政策。比如,“好”的文化(如基督教文化)鼓励合作和有节制的掠夺,因而保护合同和契约的法律制度以及私有产权制度就更容易建立。最后,地理(包括气候、疾病等)也会影响人们的经济活动的收益,从而影响制度和政策。恶劣的地理条件可能会降低预期寿命,从而降低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以至于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制度(如强制教育、教

^①在 A cem og lu 等人的文献中,如果革命成功,民主至少会运行一段时间,然后可能会被原来被推翻的精英所颠覆。

^②即指拥有政治优势或暴力优势的人。

育补贴制度等)难以建立。并且,低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也会使得政治制度更难以从专制向民主转型(Lipset 1959 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6),这进一步使得有害的制度和政策得以长期存在。所以,在分析各国经济发展差异时,不仅应重点考虑制度和政策这个基本因素,还应同时考虑运气、文化和地理等因素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通过影响制度和政策)。更进一步地,制度和政策也反过来可能影响多重均衡(运气)、文化和地理。比如,好的制度(如金融制度)可能有助于经济活动人之间的协同,从而使经济达到高水平均衡。

尽管有关经济发展与增长的研究取得如上所述的进展和成果,但仍有许多问题有待扩展研究。首先,有些运气、文化和地理也可能是内生的,而目前并没有与之相关的正式模型发展出来。比如,人均收入较低时,人们没有足够的财力用于疾病(地理因素)方面的防治,如非洲的疟疾。所以,对某些运气和多重均衡、文化和宗教信仰以及地理和疾病等进行内生化的研究,是未来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其次,运气、文化、地理和制度与政策相互之间的复杂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我们仍知之甚少,需要去细致考察。第三,有关政治制度的决定方面,还需建立一些更为丰富的模型。最后,无论是在分析一国的经济发展,还是在进行经济发展的跨国分析时,应尽量将多个方面结合在一起进行考察,而目前的文献中,这样的研究还未曾见到。

参考文献:

1. 邹薇、魏福成, 2010a 《发展的障碍: 一个政治经济学理论模型》, 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IAS) 工作论文。
2. 邹薇、魏福成, 2010b 《税收掠夺、中间品价格操控与产业升级的障碍》, 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IAS) 工作论文。
3. Acemoglu D. 2005.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Weak and Strong State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2(7): 1199- 1226
4. Acemoglu D. 2007. "Modeling Inefficient Institutions" In *Advances in Economic Theory, Proceedings of World Congress 2005*, ed R. Blundell, W. Newey and T. Persson, 341- 38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 Acemoglu D. 2009.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6. Acemoglu D., and J. A. Robinson 2000a "Why Did the West Extend the Franchise? Democracy, 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4): 1167- 1199.
7. Acemoglu D., and J. A. Robinson 2000b "Political Losses as a Barrier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3): 126- 130
8. Acemoglu D., and J. A. Robinson 2006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 Acemoglu D., S. Johnson, and J. A. Robinson 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5): 1369- 1401
10. Acemoglu D., S. Johnson, and J. A. Robinson 2002 "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4): 1231- 1294.
11. Acemoglu D., S. Johnson, and J. A. Robinson 2005a "Institutions as a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Run Growth"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ed P. Aghion and S. N. Durlauf 384- 473.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2. Acemoglu D., S. Johnson, and J. A. Robinson 2005b "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3): 546- 579
13. Azañón C., and A. Drazen 1990. "Threshold Externaliti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5(2): 501- 526
14. Banfield E. C. 1958 *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5. Barra R. J., and R. M. Mcleary 2006 "Religion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6(2): 49- 72
16. Besley T. J., and T. Persson 2010 "State Capacity, Conflict and Development" *Econometrica*, 78(1): 1- 34
17. Bourguignon F., and T. Verdier 2000 "Oligarchy, Democracy, Inequality and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62(2): 285- 313
18. Ciccone A., and K. Matsuyama 1996 "Start-up Costs and Pecuniary Externalities as Barriers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49(1): 33- 59.
19. Diamond J. M. 1997 *Guns, Gems and Steel: The Fate of Human Societies*. New York: W. W. Norton
20. Durlauf S. N., and M. Fafchamps 2005. "Empirical Studies of Social Capital: A Critical Survey"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ed P. Aghion and S. N. Durlauf 1639- 1699. Amsterdam: North-Holland
21. Eichengreen C. G., and T. V. Ypersele 2009. "Education, Corrup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4(3): 205- 231.
22. Easterly W., and R. Levine 2002 "Tropics, Gems and Crops: How Endowments Influ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NBER Working Paper 9106
23. Gallup J. and Sachs 2000 "The Economic Burden of Malaria" C.D Working Paper 52, Harvard University
24. Gerschenkron A. 1970. *Europe in the Russian Mirror: Four Lectures in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5. Ghiglino C., and G. Sorger 2000 "Poverty Traps, Indeterminacy and the Wealth Distrib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05(1): 120- 139
26. Grief A. 2006 "History Lessons of the Birth of Impersonal Exchange: The Community Responsibility System and Impartial Justic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2): 221- 236
27. Hall R., and C. Jones 1999. "Why Do Some Countries Produce So Much More Output Per Worker than Other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4(1): 83- 116
28. Husain I 1999. *Pakistan: The Economy of an Elitist State*.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9. Knack S., and P. Keefer 1995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ross-Country Tests Using Alternative Measures"

- 30 Lagerlöf N. – P. 2009. “Slavery and Other Property Right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6(1): 319–342
- 31 Landes D. S. 1998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 New York: W. W. Norton Co
- 32 Lipset S. M. 1959. “Some Social Requirement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1): 69–105
- 33 Maddison A. 2003 *The World Economy: Historical Statistics*. Pari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34 Mankiw, N. G., D. Romer, and D. N. Weil. 1992. “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2): 407–437.
- 35 Matsuyama K. 1991. “Increasing Returns,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determinacy of Equilibriu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6(2): 617–650
- 36 Moore B. Jr.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 37 Murphy K. M., A. Shleifer, and R. W. Vishny. 1989.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Big Pu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7(5): 1003–1026
- 38 Ngai L. R. 2004. “Barriers and the Transition to Modern Growth.”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1(7): 1353–1383
- 39 North D., and R. Thomas. 1973.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40 North D. C., W. Sumner, and B. R. Weingast. 2000. “Order, Disorder, and Economic Change: Latin America versus North America.” In *Governing for Prosperity*, ed B. B. Mesquita and H. L. Root 17–58.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41 Olson M. 1982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nation, and Economic Rigid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42 Olson M. 1993. “Dictatorship,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7(3): 567–576
- 43 Olson M. 2000 *Power and Prosperity: 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 New York: Basic Books
- 44 Parente S. L., and E. C. Prescott. 1999. “Monopoly Rights: A Barrier to Rich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5): 1216–1233
- 45 Persson T., and G. Tabellini. 2000 *Political Economics: Explaining Economic Polic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46 Putnam, R. 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47 Redding S. 1996. “Low-Skill, Low-Quality Trap: Strategic Complementarities between Human Capital and R&D.” *The Economic Journal*, 106(435): 458–470
- 48 Robinson J. A. 2001. “Why Is a State Predatory?” Harvard University Memo
- 49 Rodrik D. 1999. “Democracies Pay Higher Wag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4(2): 707–738
- 50 Rodrik D., A. Subramanian, and F. Trebbi. 2004. “Institutions Rule: The Primacy of Institutions over Geography and Integra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9(2): 131–165.
- 51 Sachs J. D. 2000. “Notes on a New Sociolo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 ed L. E. Harrison and S. P. Huntington, 29–43. New York: Basic Books
- 52 Sachs J. 2001. “Tropical Underdevelopment.” NBER Working Paper 8119
- 53 Weber M. 1930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54 Weber M. 1958 *The Religion of India*. G. Encocoe: Free Press
- 55 Wiarda H. J. 2001. *The Soul of Latin America: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Tra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56 Zou W., and F. C. Wei. 2010. “Productivity, Ratio of the Non-elite to Population and Property Rights.” IAS Working Paper, Wuhan University

Fundamental Caus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 Review of Literature

Wei Fuche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and summarizes four hypotheses about fundamental caus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rowth, including luck hypothesis, culture hypothesis, geography hypothesis, and institution hypothesis. The four causes all influence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echnology advance, and then affec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rowth. However, luck, culture, and geography all cannot explain the large and persistent differences in income per capita across countrie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contrary,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can do so. Therefore, more and more economists believe that the main fundamental caus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rowth are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Thu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literatures about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hypothesis, and summarizes the studies about endogenou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end, we make the concluding remarks about the four hypotheses.

Key Words Economic Development; Luck; Culture; Geography; Institution and Policy

JEL Classification O5 N1 N4 B2 E6 H1

(责任编辑:彭爽)